

從「球籍」危機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起起伏伏的四十年歷程。這一歷程已經告一段落，記錄這段歷史的必要性顯而易見。當下試圖對之做出總體評價是一件冒險的事情，因為投身改革開放的三代人都還身處其中，他們在這一歷史鉅變中的喜怒哀樂、恩恩怨怨，難免妨礙人們對改革開放做出準確的評價。但描述改革開放恰當其時，因為描述社會歷史事件，最合適的人莫過於親身經歷者，他們的描述才是對歷史最真切的記錄，不會像後起的記錄那樣可能扭曲真實。儘管這類記錄僅是記錄者的個人一己經歷，並不代表一個宏大歷史事件的全貌，但是將這些記錄累積起來，加以甄別，歷史面目就會呈現在人們的面前。情境性的記錄，依賴於經歷改革開放的芸芸眾生；對之進行總體上的描述，是學者的責任。改革開放可以凝練地歸納為當代中國從「球籍」危機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兩極跳。這是中國坐上的一趟現代過山車，既令人驚心動魄，又讓人回味無窮。

一 「球籍」與改革開放的危機啟動

中國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巨礮的。一個經典的表述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百廢待舉、百業待興的狀態下被迫啟動改革開放。文革長期被執政黨定性為持續十年的「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①。在歷史階段的區分上，十年文革（1966-1976）與之前的十七年（1949-1966），被區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早期歷史的兩個階段。但從總體上講，這一時期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國家一直處在左傾、甚至是極左的狀態^②。差異是前十七年的階級鬥

爭時起時伏、有張有弛；後一階段的階級鬥爭持續不斷、高度緊繃。左傾的中國，就是一個拒絕融入現代政經文明的國度。因此，在階級鬥爭主導整個國家的基本國策時，即便偶爾在「抓革命」的時候順帶「促生產」，但整體來說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對不是國家活動的側重點，僅僅是政治活動的輔助物。由於國家長期處於政治顛覆狀態，經濟的總體面也絕對不能以向好目之：即便經濟增長狀況有時候是令人滿意的，但那是在改革開放後以經濟中心的眼光衡量的結果，而不是在經濟必須蟄伏於政治之下的處境中人們做出的評價。這一歷史階段的經濟狀態，最後結果正是人們熟知的「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③。這一斷定一直讓支持文革的人士不服，認為不符合當時經濟的真實態勢。其實，文革阻斷了中國進入當代的創新性經濟體制，貽誤了科學革命的進程，耽擱了中國進行現代制度建構，破壞了基本的經濟秩序，不僅對當時的中國經濟造成了致命的傷害，也對中國現代化經濟體制的建構成成了長遠和深刻的危害，更對中國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全球化契機尋求國家發展造成了巨大障礙。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陷入全面困境的重要動因。執政黨曾經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指出它「明顯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誇大了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與規模，「導致敵我的混淆」，是毛澤東「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的結果^④。這一理論最為負面的影響，就是將中國引上了一條逆現代化的道路，讓中國遭遇晚清以來形成的現代化大勢的倒轉。並且由於這一逆現代化決斷的長久延續，讓中國完全錯過了二戰以後寶貴的國家發展機會，深深陷入了發展的困難，即便是重回發展軌道也將處在急起直追的「後發劣勢」之不利處境中^⑤，其長遠的消極影響，將長期伴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1976年毛澤東去世，其生命的自然終結為中國開啟一個新的國家狀態提供了可能。一個國家的命運受制於一個人的自然生命進程，這本身就是一個逆現代化的經典案例。中國現代化的政治經濟肌體受到嚴重傷害不說，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因之聚集了過多的逆現代化因素，對重新啟動現代化進程造成極為深遠的消極影響：現代化的共識將為之撕裂，現代化的目標模式將為之模糊，現代化的規範願景將很難凸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將中國拋向了一個既抵抗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而又尋求前無古人的嶄新現代化道路的深刻矛盾之中，將革命時代的烏托邦理想與現代化建設的現實目標安頓在一個相互衝突的結構之中，將中國死陷在古今中西對峙的思維陷阱的同時，又設置了一個超越古今中西的難以實現的宏大目標——這些不為人重視的深層矛盾，將伴隨後毛時代的中國歷史長程。將中國從階級鬥爭的政治中心局勢扭轉到務於發展的經濟中心局面，不過是為了處置毛澤東帶

給中國的表層危機；而將中國從抗拒現代化主流方案的精神定勢扭轉為真正擁抱現代化主流方案的開放精神，才是中國需面對但難以處置的後毛時代的深層危機。這兩種危機的疊加結構，是中國扭轉毛澤東國家思維的重中之重、難中之難。

從1976年毛澤東去世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經歷了執政黨內部關於中國前途與命運的複雜鬥爭。在「兩個凡是」與「改革開放」之間，後者以一種勉強的方式獲得黨內認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⑥，所強調的不過是沿循毛澤東路線。雖然「兩個凡是」後來在政治上被徹底否定，但在觀念上卻具有更為長遠的影響力，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呈現為危機啟動的一個重要表現。因為這是改革開放必須直面的後毛時代的一種政治理念，它與前述表層危機與深層危機扣合，構成歷史危機與現實危機的結合體。

所謂中國改革開放的危機啟動，是指中國在危機處境下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就其基本含義來講，其一，改革開放必須應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遺產，面對「崇毛」與「反毛」兩類社會群體與不同政治思路。這不單是處理毛澤東的遺產問題，也是不得不長期處理的現實難題。其二，它必須應對中國發展的「後發劣勢」問題，同時得建構中國發展的新型願景，這是一個現實與未來共在的難題。其三，它必須面對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含混所催生的現代化動力與阻力交錯的困境，需要隨時隨地應對此前國家思維帶來的現代化強大阻力，並且艱難地聚集推進現代化的動力。可見，後毛時代的中國不能不啟動現代化進程，但這一進程將會有多艱辛實在有些出乎意料。而將這些危機匯聚成一個高度凝練的表述，就是中國不轉變發展模式必會遭遇「球籍」危機。

中國可能遭遇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機，追溯起來，是毛澤東在1950年代率先提出的。他說中國：「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甚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⑦這樣的表述體現出毛澤東對中國發展所具有的危機意識，但這樣的認知卻直接推動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這一思維是中國尋求現代發展在總體上呈現為危機啟動的定勢的一個重要標誌，自然是受現代化大潮催生的產物，但它造成的激進現代化運動，則預制了中國失衡的現代化模式。

1978年中國啟動的現代化進程，與毛澤東期待現代化卻採取了逆現代化主流模式，最終政治期望與結果恰成反比的狀態有很大不同。這是中國自晚清、民國的兩波現代化嘗試之後的第三波現代化努力。中國在經濟增長上取得的奇迹，似乎顯示國家經受住了這次現代化大考驗，但「球籍」危機依然貫穿於這個進程的早期階段。這次現代化進程從精神氣質上與毛澤東理念相貫通，只不過毛澤東採取的大躍進手段與改革開放時期執政黨借助的現代化市場經濟手段，呈現出重大差異。

1980年代後期，「球籍」危機意識充盈中國。引起世人關注的「球籍」討論，將中國改革開放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的現代化目標的嚴峻問題，擺到了國人面前。開除中國「球籍」的危機感讓人警醒，追趕型的經濟發展讓人甚覺緊迫。論者指出：「如果『球籍』標準是經濟發展水平，那麼從中國經濟目前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看，我認為中國早就被開除了。因此不能光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程度。如果綜合評價，中國有十億人口，在世界上佔有那麼重要的位置，那麼『球籍』永遠也不會被開除，也無所謂『球籍』問題。對這個表面上看並不嚴格的問題，我想，實際的目的無非是一個意義：中華民族意識到現代化步伐的艱難，意識到我們與實際先進國家的差距，並力圖呼喚全民族的憂患意識，以加速我們的現代化。」^⑩這裏論及「球籍」，有兩個着力點值得人們留意：一是國人對「球籍」的擔憂，是憂患意識的表現；二是國人對「球籍」的焦慮，生成的是加快中國現代化步伐的意念。前者倒是中國自古至今的優良傳統，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告子下》）是矣；後者則是中國現代化遲緩促成的國人心理，所謂「快馬加鞭」是矣。

就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時間維度來看，毛澤東的「球籍」論說不上是直接先導，而1980年代晚期的「球籍」論則是發展遲滯催生的論斷，兩者似乎並不能同時用來說明啟動改革開放的國家處境。如果說同樣的論斷之間有甚麼差異性的話，那就是化解這一論斷的方式途徑相當不同：前者對「球籍」憂心如焚，引發的是肆意妄為的大躍進；後者對「球籍」關注有加，推動的是扎實的現代化。即便如此，在「球籍」危機的緊張心理氛圍中開啟的這一波中國現代化進程，由於直接受到後文革時期經濟凋敝局勢的催促，勢必將改革開放推向一個快節奏、高速度的發展平台。危機之下，改革開放的系統、理性謀劃，將會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具體問題導向所主宰。這是三重重壓下注定的改革模式：一是自晚清以來中國的「被動挨打」；二是中國在二十世紀中後期的發展停滯不前；三是世界本身的疾速發展。唯有時不我待的社會心理，才會讓國人心生「球籍」危機感，也才會讓國人緊盯改革開放的當下績效，但這無疑又成為引致改革開放某些危機的深層導因。因應危機啟動的改革開放，將會長期處在不斷處置危機的情境之中。

二 「殺出一條血路來」：改革開放的衝撞模式

簡單地講，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由兩個構成面合成的一個國家圖景：一是改革，也就是將中國剛性的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改變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而轉變中國政治統帥一切的局面，對政府職能和體制進行適度調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開放，也就是將此前因批判「封、資、修」而幾乎完全封閉起來的國門打開，尤其是向西方發達國家打開國門，以便引進發達國家的有效治國方略，促進中國進入現代發展的快車道。這就注定了

改革開放將是一場怵目驚心的鉅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塑就的國家模式，是完全與之異趣的。而歷經三十年的精神塑造、制度強化與生活滲透，這一套國家理念與行動方式已經在方方面面形塑了國人的思想與行為，並且已經深入骨髓，難以撼動。因此，啟動與文革做派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進程，意味着中國需要在精神價值、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上同時進行調適，這豈是能夠輕易做到的事情！如果說對計劃經濟體制與集權政治體制的撼動已經具有極強的挑戰性——因為它需要扭轉控制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其震動之大完全出乎意料；那麼要想把一種以往將公眾人生完全寄託於國家的國民心態，從均平理想、政府配給和生存邏輯的狀態，扭轉為追求公正、按勞分配和發展邏輯，則無異於炙冰使燥。

只要是親歷其境的人們，對之就會有極為深刻的體會：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唱三歎、一波三折、回流不斷，在在向人們表明它並非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唱三歎，主要指改革開放前後不斷出現的爭議和質疑，讓這場社會歷史鉅變的正當性隨時受到拷問；一波三折，主要指改革開放每三五年就會經歷的曲折、倒退與勉力前行，讓這場本可以較為順利地達到目標的改革運動變得起伏跌宕；回流不斷，主要指改革開放走到關鍵階段的時候，計劃經濟、全能政府與集權政治的支持者總是試圖全力將之拉回此前的舊局。這些舊勢力的故態復萌，是這場變革進程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歷史情景。

不過，僅就改革開放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來看，實屬不易，讓人讚歎。人們熟知，改革開放有一個由點到面的擴張過程。在面上全方位推進改革開放，從1978年算起，斗轉星移，直到1992年；但點上的突破，則在1980年代中後期初步呈現出改革開放的正當性和高績效。因此，將眼光聚焦到改革開放最具有點上價值的試點——深圳，就可以得知這場變革的基本態勢。

在此需要略作回顧，才能將話題集中於深圳的改革試點。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終結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政治，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嘗試：「立即動員起來，鼓足幹勁，群策群力，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進行新的長征。」^⑩但從總體上講，改革開放的正式啟動還有待時日。在之後的幾年內，中國政治主要還是圍繞糾正文革的錯誤、恢復計劃經濟秩序、重樹之前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展開的。就糾錯言，手握重權的領導人發表了〈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的談話^⑪。以經濟秩序論，負責經濟政策的領導人強調必須調整文革軍管時期將軍管經濟以致各領域、各部門發展失調的問題，「調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按比例，能比較按比例地前進」^⑫，這還是人們較為熟悉的計劃經濟思路。從目標講，領導人謂「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⑬，這一目標在1950年代就已確立，這時的表述甚至在早就格式化的用語上都沒有多大改變。這類努力自有其必要，因為人們所熟知的秩序恢復不了，建構新的政治經濟秩序也就屬於畫餅一類。

按照執政黨長期的執政思路，如果要執行一個事關全國的大政方針，一定要先行試點，然後以點帶面，全面推廣。因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後，一方面致力於恢復過去的政治經濟秩序，另一方面尋求新的政經政策的試點辦法。最初的試點性探索，有安徽與四川農村經濟的改革，之後有城市經濟體制擴權改革，但這些嘗試都還沒有提供現代化全套方案的試點意義。經濟特區的設立，可謂推動改革開放最具價值的試點。特區政策的確立，也經歷了事前的摸索。198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採納廣東省的建議，將「出口特區」名稱改為內涵更加豐富的「經濟特區」。同年的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布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四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由此完成了設立經濟特區的正式決策和立法程序，標誌着中國經濟特區的正式誕生^⑬。

設立經濟特區的政策的确立，解決的只是政治障礙與立法程序的問題，經濟特區如何開辦，又怎樣運作，能夠達到一個甚麼樣的試驗效果，當時的決策者與實施者都還心中無數。從後來的效果反推，人們可以知曉，並不是設立經濟特區就可以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珠海、汕頭、廈門的發展成就便遠不如深圳。因此可以設問：何以深圳會取得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呢？答案是，深圳官民共同表現出背水一戰、絕不認輸、務求成功的精神與行為，並且採取了適宜的發展策略，實行了有利於發展的種種舉措；其他地方的相應安排則不如深圳。因此，四個經濟特區的發展績效呈現出天淵之別。

深圳本是廣東設立經濟特區政策重點着力之地，但深圳特區為中國市場經濟和行政體制改革探路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中央層面的政策布局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廣東和深圳地方各級領導和公眾的群策群力，才是不可或缺的直接原因。而關乎深圳特區發展的堅定決心，是深圳能為全國市場經濟發展探索出成功之路最重要的原因，這樣的決心來自於國家領袖與地方領導的同心協力。其中最能夠鮮明體現這一決心的，就是眾所周知的一句話：「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句話出自鄧小平。據廣東省老領導回憶，廣東的改革探索定位為「加工出口特區」、「出口特區」，鄧小平在認可的基礎上強調：「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⑭鄧小平所言的「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含義至少有兩個：一是給特區政策開路，但沒有中央財政支持；二是鼓勵廣東衝出既定政策框架的硬性約束，以一種犧牲精神探路且為經濟社會發展蹣跚出一條新路來。

如果鄧小平說「殺出一條血路來」主要是對廣東省領導的鼓勵，那麼廣東和深圳的官民就直接展現了「殺出一條血路來」的勇氣和幹勁。廣東省的領導當時向中央要政策，既要冒意識形態的風險，要了政策之後又要冒實施政策是否可以奏效的風險。這些風險疊加起來，足以毀掉任何級別官員的政治前途。但當時廣東省的官員，尤其是習仲勛、任仲夷兩任領導，對廣東的特區改革所下定的決心前所未有，在執政黨內罕有其匹^⑮。殺出血路是與政治勇

氣和責任擔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三者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能將改革開放變成現實行動。而對1980年代初期的廣東來說，恰恰因為省市領導敢於冒險、勇於探路、善於摸索、慣於學習、因勢利導，確實給予廣東、尤其是深圳特區實幹官員與廣大公眾巨大鼓舞。

就深圳特區直接從事經濟改革組織工作的人來講，他們是否能擔負起殺出血路的實際責任，關乎改革開放政策是否能夠真正落地，從而有效推動深圳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招商局蛇口工業區負責人袁庚是為廣東與深圳實際擔負改革責任的關鍵人物之一。在一個亟需打破「吃大鍋飯」的僵局，但卻不重視經濟合同的氛圍中，袁庚不畏艱險，堅韌地為現代經濟理念與經濟制度的落地而破冰。1979年，袁庚提出掙脫現行體制中「吃大鍋飯」的設想，在各工程承包單位負責人會議上作過一段發言：「我們是先禮後兵，一切按經濟規律辦事，用經濟手段去管理經濟；諸位一定要記住，你們給我們訂立的是工程合同，是招標承包的，提前有獎，大家皆大歡喜，但延期要罰，誰也逃不掉。」^⑥這樣的表述在當時中國是相當稀見的，是一種現代經濟見識與政治勇氣的表現。而他在1984年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更被視為「衝破思想禁錮的第一聲春雷」^⑦。正是富有幹勁的這一代深圳經濟組織領導人創造了深圳奇迹，為改革開放蹣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新路。

後來，廣東深圳模式逐漸推向全國，成為改革開放的基本進路。這是在中國對市場經濟、政府現代職能完全陌生的情況下，靠勇氣和幹勁闖出來的一條中國發展道路。不得不承認的是，這樣的探索雖以效果自證了它的正當性，但依靠的都是勇氣，欠缺的則是智慧，完全是一種敢想敢幹的衝擊碰撞。幸運的是，它取得了成功；不幸的是，它對中國現代化的行穩致遠，難以發揮制度的理性引導作用。事實上，在中國大多數地區，由於缺乏這種領導人氣質，因此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效明顯不如人意——在四個特區中，只有深圳的示範意義得以展現出來。這是一種令人深思的差異，證明一種政策的分區收效可以是大為不同的。而在其餘地區，深圳的示範效應也千差萬別，甚至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這是一種讓人驚詫的現象，證明一種有效的地區發展模式並不一定能順暢地成為全國效仿的對象。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袤、各地發展程度懸殊的國家來講，必須用更為複雜有效的政策布局和資源動員方式，才能全面促進國家的現代化發展。

三 路線之爭與改革開放定準

深圳的發展績效有目共睹，但在執政黨內的評價極為不同。人所共知，在決定開辦特區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就有人在有生之年堅決拒絕到特區視察，以表明自己對特區政策的保留態度。而內地一些落後地區領導到深圳參觀考察後，不僅沒有為深圳的快速發展所震撼，反而對深圳「復辟資本主義」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向中央痛陳特區政策的失當。

對深圳特區的挑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挑戰，認為深圳實行的不過是資本主義那一套，與建國前西方國家在中國強制設立的租界相似。為此，身居政治高位、同時是理論界領袖人物的于光遠不得不撰文反駁，指出「深圳特區就不是甚麼『政治特區』，不是社會經濟制度方面的特區，而只是經濟政策方面或者經濟體制方面的特區，或者簡單地說只是經濟特區」^⑧。在明確特區的經濟屬性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現在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因而我們在深圳實行的特殊政策中可能有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一種是只適用於經濟特區的，這樣的東西就是在將來也不適用於其他的地區。還有一種是現在雖然還只在經濟特區中採用，但將來很可能全國都要採用。」^⑨顯然，這既是一種退讓性的解釋，也是一種限定特區功能的解釋：前者是一種政治開解，讓那些心懷社會主義原教旨意念的人們對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所具有的社會主義政治屬性感到放心；後者是一種適用性限定，旨在寬慰那些極左和左傾人士對於將在全國推廣深圳做法的憂懼。

另一類挑戰是針對特區自身發展評價方面的。論者指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速度誠然很快，但卻是依靠大量投資造就的。同時，深圳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不斷超過工業總產值，這種表面的繁榮頗受質疑；而且深圳基建投資的外資比重並不高，吸引外資的作用未能凸顯。因此，深圳的問題已經足夠說明它的成敗^⑩。

基於上述兩類挑戰，官方當時以「交學費」對之做出正式回應。1985年深圳市長在訪問中指出：「既然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經濟特區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既然深圳特區還是一個試驗，對全國都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也可以作為『交學費』……假如我們的目的地要走一百米，現在才走了十米，你能說是失敗嗎？」^⑪這同樣是一種退讓性的辯護。由於經濟特區的績效還有待一個較長時段的證明，因此就不能不面對類似的懷疑；即便它後來的績效很難為人質疑，但是它的模式及其效應還是難以受到廣泛認同和普遍讚賞。

進一步地說，放寬視野審視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大論戰，更可知曉改革開放從未行進在一帆風順的道路上。有論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路線之爭歸納為四次論戰：第一次大爭論起於1977年，止於1978年，主題是「兩個凡是」還是改革開放；第二次大爭論起訖時間是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主題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第三次大爭論發生在1995到2002年，主題是私營經濟究竟是禍水還是活水；第四次大爭論出現在2004到2007年之間，主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是搞錯了^⑫。在這些主題之下的具體爭論論題，廣泛涉及改革開放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見其間遭遇的種種艱難險阻。

其中，有兩個年份具有特別的象徵意義，一是1989年，二是1992年。1989年是改革開放風雲突變的一年：在官方主導的改革遭遇政治瓶頸的時候，民間呼籲深度改革從意願表達升級為走向街頭。這是兩種改革想像之間一次正面的衝突，結果是改革自身受到重創。此後的兩年，改革停滯不前不說，改革的回流令人觸目驚心：計劃經濟思潮捲土重來，「過幾年緊日子」的

說法不脛而走；「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定調明顯衝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宣告改革開放失敗的言論甚囂塵上；回到剛性控制時代的苗頭明顯可辨。這一年確實是改革開放要麼終結、要麼重啟的一個關鍵年份，而在官方的定調中，也以「政治風波」載入史冊，並且以「出現嚴重曲折」和「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成功地穩住了改革和發展的大局」來定位這一年前後的中國局勢^{②③}。

1992年的象徵性意義，在於真正穩住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大局。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堅持改革開放的講話。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重中之重在於強調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的決不動搖：「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②④}改革開放的定音一錘，由此落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還強調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堅持下來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諸如改革的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改革不要被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屬性束縛手腳；關鍵的是全力發展經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但在這些政策定調背後需要人們高度關注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改革開放要秉持「不爭論」的態度，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甚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②⑤}中國長期的意識形態爭論、尤其是文革時期的爭論，嚴重耽誤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意識形態爭論，也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嚴重困擾，貽誤了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因此，這是鄧小平對改革開放必須避免意識形態化的一次明確表態。它讓改革開放大政方針避免陷入無謂的爭端之中，力求避免陷入文革式圍剿與激進化顛覆兩個極端。這也為中國此後二十年左右成功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提供了辯護詞與庇護所。

「不爭論」的定調，為中國一心務於經濟發展解除了政治負累。其附帶而生的兩個成果，讓改革開放成為顯著推進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疾速增長的強大動力：一是改革開放不再遭受長期以來的質疑與批判，因此成為國家一心謀求經濟發展的正當性理由；二是改革開放與意識形態兩相疏離，因此自身的正當性得以確立。如果說此前改革開放還是需要專門解釋、辯護甚至是堅決捍衛的大政方針，那麼這時它似乎已經具有免於質疑的政治超然性。儘管在中國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政黨—國家意識形態的陳述依舊，但人們已經作別了那種先期以意識形態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的政治習性，逐漸習慣於以「改革開放」作為判斷某種理念與行動是否正當的理由。在這種氛圍中，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目標具有了不可撼動的核心地位，「改革開放」幾乎與「經濟發展」成為同義詞。儘管其間也出現過關於國有企業改革性質的爭論、改革路向

的爭端、政治體制改革模式的爭議和市場經濟改革是否取法新自由主義的爭執²⁶，但從總體上講，都沒有撼動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目標。改革開放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廣泛認同，以至於成為曾經嚴重分裂的各家各派爭奪的最重要的正當性資源。

改革開放之能夠落實為專心致志謀求經濟總量增長這一不會導致太大分歧的目標，取決於這一目標本身的正當性，從而獲得了各方的支持：在黨內，即便是計劃經濟的堅定支持者，在1992年後也明確承認自己所熟悉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可能已經不再適應中國當代經濟發展需要，且婉轉表示市場經濟才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不二之選²⁷。在民間，即便對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毀譽參半，但對這一經濟形式促使中國快速積累財富的事實似無分歧，差異只是：左派希望財富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右派希望創富的制度機制更為公正。改革開放在黨內取得廣泛認同，確實有些令人驚訝，因為此前人們對改革開放的評價不止是表現在認同程度差異上，甚至直接投射於臧否決斷上。而這時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檯面上的反對者，甚至已經很少檯面下的批評者。改革開放獲得眾口一詞的讚許，自然與其取得的驚世成就緊密相關。然而一旦取得這樣的地位，也就讓「改革開放」從此形容詞化。「改革開放」本是動詞，也就是標示中國社會劇烈變遷的狀態詞；而「改革開放」的形容詞化，也可以稱之為改革開放的名義化，讓人們難以摸清張口大談改革開放的人士究竟是否真心誠意地支持改革；而且由於改革開放落實的唯一目標就是經濟增長，因此以改革為名義變換着手法、無條件支持政府調控經濟的左派是不是屬於改革者，也愈來愈難以判斷。在經濟總量疾速增大的情況下，改革開放自身的內涵急需澄清，不過這是後話了。

四 國家崛起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改革開放取得普遍認同，跨越了官民與左右的深刻分歧，實現了極為廣泛的共同承諾。達成這樣的共識，自然與改革開放促成中國經濟總量、尤其是GDP的疾速增長具有密切關係。而以GDP支撐的國家崛起，又反過來強有力地支持了改革開放的正當性論說。1989年後差不多十年的功夫，中國不僅作別了一段內外交困的艱難時期，而且GDP的疾速增長確實讓全世界瞠目結舌。這裏有三個需要分別描述與分析的問題：

第一，中國為了獲得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經濟全球化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2001年底，經過艱苦的談判，中國終於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成員。但是自簽署加入WTO的文件始，國內對之心存疑慮的人不在少數，甚至有人攻擊中國簽署了一份賣國條約。即便是中方的談判者，也對中國是否能夠承受加入WTO的壓力心存疑慮：「加入世貿組織給我們帶來的挑戰，主要有兩個：一是給國內企業帶來的挑戰。市場開放了，國外企業和商品更多

地進入中國，肯定會有衝擊，特別是對那些技術落後、規模小、經營管理水平低的企業更大一些。但是這個挑戰是遲早要面對的，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中國企業不可能關起門來發展，必須要走向世界，學會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競爭中做大做強。……二是對政府的挑戰，這才是最大的挑戰，政府經濟管理的體制、思維、工作方式都要相應變化，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盡快提高駕馭市場管理的能力和水平。」^②成功加入WTO，是中國自1986年申請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以來堅持十五年所爭取的結果^③，人們有相應的擔憂實屬正常。但這十五年來中國政府一以貫之的積極態度，確實呈現出努力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契機的堅定政治意志。中國加入WTO十幾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不僅克服了以上兩個嚴峻挑戰，並且獲得了全球範圍內最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資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④。

第二，中國政府專心致志地謀求經濟發展，堅守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目標，從而實現了經濟快速且持續發展的目標。毋庸諱言，近二十年左右中國的內政和外交面臨多方面的挑戰，而且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質疑之聲不絕於耳。但中國的執政黨與政府一直堅持經濟建設是國家發展的中心目標不變，在政策布局、資源投入、幹部制度、實際舉措上，都給予充分保證。即使國家領導班子歷經數屆更換，發展經濟這個中心目標也沒有動搖。「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⑤，這就為中國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提供了關鍵的政策保障。

第三，中國在經濟總量持續壯大的情況下，國家愈益顯得雄心勃勃。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試圖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經濟發展的遲滯，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方式上的梗阻。因此，時任國家領導人將國家發展目標確定為二十一世紀中期經濟總量翻兩番。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國家具有萬丈雄心的表現。但今天看來，這一目標似乎顯得保守，因為中國從2000年算起，到2016年的十七年時間，經濟總量就翻了兩番，而2002年中共十六大本來預計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點是在2020年^⑥。提前實現預期目標，無疑大大鼓舞了中國發展經濟的自信心。基於這樣的經濟發展趨勢，此時人們已經不安於中國尾隨發達國家之後的發展定勢，開始樂觀地預測中國登頂世界的前程。2016年，長期從事國情研究的人士計算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是美國的1.36倍。即便計算結果引起巨大爭議^⑦，但這樣的計算所展現出來的國家雄心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家念想，簡直是天壤之別：試想，誰敢在四十年前斷言中國的綜合國力將超過美國？

正是由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不惟「球籍」危機意識早就煙消雲散，而且國家雄心日益凸顯。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幾乎對西方發達國家亦步亦趨，潛心學習。當下，國家權力當局明確倡導的是「四個自信」：「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當今世界，

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②4} 站在「四個自信」的歷史基點上，中國的自信在內政和外交上都充分體現出來：在內政方面，中國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已經不滿足於解決經濟總量的增長問題、不滿足於物質器物層次的「四個現代化」目標、不滿足於現代文明的學習者身份，一個旨在全面復現中國歷史文化輝煌的目標凸顯出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②5}，成為當下中國的內政目標。在外交方面，中國不僅從實際舉措上提出了全球治理的設計方案，這就是今天如火如荼地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②6}；而且從人類基本理念上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替代性命題，這就是當下為人熟知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②7}。如果說「一帶一路」倡議主要是由國家間的合作項目支撐的話，那麼「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主要是中國在取得經濟高速發展的成就之後在世界治理理念上的一次飛躍。這標誌着中國不只在國家範圍內謀劃發展，而是着眼於全球範圍、人類命運的大目標，為發展引路。這意味着中國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承擔更多的經濟義務，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負擔更多的物化責任。相對於改革開放初期圍繞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展開的艱難試驗，此時此刻，中國發展目標的恢宏氣勢確實顯露無遺。

改革開放的悲壯起點與矚目成就，使捍衛「球籍」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兩個命題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效果。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兩極跳：從努力跳出人類低端發展的一極，到嘗試跳上人類高端發展的另一極；四十年改革開放促成的經濟飛躍，確實有理由讓人們熱議「中國崛起」。國家崛起與世界局勢的變化，一時成為全球範圍的熱門話題。在中國，《大國崛起》(2006) 電視紀錄片熱播，觀眾關注的焦點其實並非九個國家輪番崛起的歷史及其經驗教訓，而是「大國崛起的中國鏡鑒」，也就是對中國崛起的宣示^{②8}，這是中國的大國崛起想像的一次系統表現。中國和平崛起論述的出台，則是對國家崛起的理論闡釋^{②9}。從捍衛「球籍」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兩極跳之間，大國崛起論是一個中介或橋樑，適時成為中國問題情境轉換的契機：在捍衛「球籍」的情境中，人們甚至必須為尋求發展的政策進行辯護；「代價論」、「交學費」這類辯護話語的出現，就體現了人們對中國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那種尚無把握和缺乏底氣的猶疑心態。大國崛起話題的出台，讓人們得以樹立起對中國發展的信心。缺乏大國崛起話題的奠基，國人是很難在「球籍」話題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話題之間實現順暢轉換的：從一個低端的危機性話題轉向一個高端的領導性話題，需要一些心理轉變契機。雖然大國崛起話題後來一度處於廢止狀態，因為國家權力當局擔憂這會讓世界各國感到不安，於是改革開放初期「韜光養晦」的策略重回話題舞台，但它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準備了精神資源。

隨着中國經濟總量的顯著增長，以及國家展現出強烈的進取心和有所作為的政策導向，大國崛起的話題已經不能與中國的國家雄心相匹配了。此時，「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命題應時而生。一個克治了「不發展病症」的國家，

在國家發展前景頗顯樂觀的情境中，一定會浮現相應的樂觀的全球性思維：「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着中國的國家治理運思已經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而是廣及全球事務；中國不是在一國界限內聚集和使用資源，而是在世界範疇中看待資源及其使用問題；中國不是在國家規模內考慮發展成果分享問題，而是在世界格局上思慮發展成果共享的問題。這命題在憂心「球籍」問題時期的中國可以說是天方夜譚，因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國家才會發揮的想像，也是高度發達的國家才足以兌現的發展目標。就今天中國的硬實力來講，這一關乎全球治理的國家目標似乎有些提前出台的意味，但至少它提示人們，中國的發展的確走到了另一個端口：這是一個全然不同於危機四伏之際浮現的「球籍」話題的端口，而是一個顯示國家已經達到高度發達水平的高級端口。

之所以說「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國家發展到高級端口的話題，是因為國家兌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極為強大的硬實力，也需要具有與之相應的軟實力，以及展現縱橫捭闔、游刃有餘的全球治理技藝的巧實力^④。中國在這三個方面都存在軟肋：硬實力尚不足以支撐起國家引導全球發展的雄心，綜合實力還需要進一步提升，才能在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前提條件下仗義疏財，為全球治理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支持。軟實力還處在謀求提升的初級階段，在將西方國家歸諸謀利性國際治理類型的基礎上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便是中國提升自身軟實力的一種嘗試。但中國還必須經過堅韌的努力，才能讓世界接受「共商、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巧實力上，中國倡導全球治理的國家方案時，亟需強化其綜合性與靈活性。僅就「一帶一路」提法上出現的「戰略」、「謀劃」與「倡議」的表述變化，便提醒人們中國僅在方案表述技巧上就有待改善。中國的全球治理處境，是一個可以理解的尷尬現狀，因為從低端一極的「球籍」危機走出不久，便要適應高端一極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複雜要求，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時間與經驗代價的。

五 兩極跳之外：改革終結論與重啟論

經歷了從「球籍」危機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兩極跳，中國確實嚐到了改革開放的極大甜頭。可以想像的是，對改革之初設想中國發展目標的那一代政治家而言，中國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實在是喜出望外。在那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眼裏，中國通過「韜光養晦」，才有希望在二十一世紀中期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不料中國在「球籍」危機意識中催生的強烈發展願望，經過雙重兌現——兌現為國家治理重視發展經濟的基本國策，以及兌現為全民積極謀利的市場行為，竟然在四十年後的今天，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低端一極的處境，決定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只能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的基點上，設想中國作別貧困的發展目標；改革開放能夠達到當時讓國人豔羨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那已經難以想像。從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制度創新上講，在當代世界，像中國這樣一心謀求發展的國度並不多，而能夠將「社會主義」與「市場」兩個被認定是對峙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接起來，就更是稀見。這確實是「中國奇跡」得以浮現的決定性條件^④。

當「中國奇跡」浮現的時候，國際社會關於中國的研究議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最初，國際社會是抱着一種走着瞧的態度來看待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種將信將疑的心態主導了國外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的看法。有論者提出一種具有強烈比較意圖的描述，凸顯了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與崛起後的鮮明差異：「1978年的中國，一位自信、果敢、具有遠見卓識的CEO接管了一家經營不善、瀕臨破產的大公司。員工們士氣低落、毫無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識。……2009年的中國，公司已經從破產邊緣走出，實現了豐厚的利潤，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它機智地應對了挑戰與危機，在經濟上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⑤及至當下，「中國統治世界」與「中國不會統治世界」的競爭性話題的出現，至少從側面顯示出中國從焦慮「球籍」的欠發展狀態，跳躍到設計人類未來與全球治理方案的另一極之後，對國際社會科學界議題設置的影響力。一個「後西方世界」的可能性正被國外學者所討論^⑥，而這些因應於中國發展成就發表的議論，確實讓國人有理由感到驕傲自豪。

在中國發展的高端一極展現出來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命題，是中國未來將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連繫起來的大目標。能否實現這一治理目標，端賴中國發展的持續性是否具有保障。如果按照經濟學家的發展論說，一個國家在實現起飛階段以後，就會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發展狀態，因為「以現有的歷史材料來看，既然起飛要求人的心理、社會、技術和制度發生較大的變化，那麼，這些變化就很難使我們又面臨真正的倒退。各個社會中的人都必須不斷努力才能使增長持續向前」^⑦。儘管「起飛」被認為是一個有欠嚴格的概念，並且受到經濟學家同行的廣泛質疑，但用於解釋現代國家早期經濟迅速發展的現象還是比較生動的。真正令人質疑的倒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起飛後，是不是就一定會進入持續增長階段？儘管論者提出了人們不斷努力的前提條件，也不見得就能保證發展的持續性^⑧。不過一個令人安慰的信號是，中國確實試圖在各方全力投入的號召下，嘗試讓經濟增長的奇跡綿延下去。與此同時，擔憂中國改革開放倒退，因此力求避免改革開放成果得而復失的呼籲也為人們所關注。

改革開放從捍衛「球籍」的低端一極躍遷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端一極，前提條件當然是持續、深化的改革開放。在透過改革開放實現兩極跳的情況下，中國恰恰出現了關於改革開放自身的前途與命運的爭辯。這與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基本精神大相逕庭，但也是國人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窘迫處境：對改革開放評價不一的社會事實，讓鄧小平的努力顯得有些徒勞無功。如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處在發展但水平不高、有效但收穫不大的

狀態，像鄧小平那樣主張「不爭論」是可以為人們廣泛接受的。不過，一旦改革開放取得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而且居於全球經濟體前沿，各種分歧就一定會不可抑制地浮出檯面。因為經濟發展成效顯著，國家創富收效明顯，國民如何借助公平分配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就成為順勢出現的難題。一個經典的對峙性命題，即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問題，就會引爆整個輿論場，並對公共政策發揮不同方向的拉扯作用^④。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便會成為撕裂社會、左右改革的尖端難題。

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成為決定自身前途與命運的制約性因素，這是頗具反諷意味的，但也是當下中國必須面對的殘酷事實。回溯改革歷程，可以發現它從來就沒有一帆風順過：在理念上，改革開放一直受到執政黨內保守派的狙擊。同時，因為改革開放是以實際效果來標示它的正當性的，改革理論的闡釋一直處於疲軟乏力的狀態，其遭受質疑不會令人意外。因此，保守派對改革派的攻擊，長期讓改革開放在規避理論爭議的條件下推進，這正是鄧小平晚期乾脆決定「不爭論」的重要緣由。在制度上，改革開放圍繞經濟增長的目標展開，因此對於經濟發展模式之爭同樣採取迴避態度，這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究竟誰對誰錯的問題隨時干擾改革開放的進程；加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屬於政治上的一錘定音，在理論論證上也一樣乏力，就此給改革開放的正當性論證造成極大困擾。在效果上，改革開放確實讓中國的GDP顯著增長，但自居意識形態正統的人們認定國家發展只是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並不能保證國家真正強大起來，這讓人們對改革開放意義的爭端持續不斷——反對者強烈主張：改革只是產生了權貴資本，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造成了顛覆；改革製造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還不如文革時期中國的公平程度。而以現代願景奠基，為改革開放進行規範的辯護長期受到政治抑制，於是改革是否能夠持續，便成為一大疑問。每每在改革遭遇挑戰，尤其是國家處境困難之際，關於改革的左、右兩種終結論就會猛烈叩擊人們的心門。

從左的一面攻擊且籲求終結改革，是一種呼籲回到計劃經濟體制的陳詞濫調。至於以為文革招魂的方式來終結改革開放，就更是極左人群的老生常談。這類改革終結言論大致處在應者寥寥的窘境，倒是對改革寄予極大希望的人群所發出的改革終結論，令人歎息。早在本世紀初，就有來自改革陣營的學者明確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終結：「在經過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蓬勃生命之後，中國的『改革』看來正在死亡。如果按照一般概念把中國改革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我們看到，政治改革在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經在1989年初夏的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血腥的葬禮；而經濟改革，作為中國改革的真正實際，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大體完成了其推動中國市場化的使命，把中國帶到了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的匯合處，從而為自己畫下了句號。」^⑤論者給出了改革終結的八個表徵：意識形態的回歸、文革的歷史回流、政治的維穩至上、經濟的體改停頓、制度的產權死結、國際的衝突加劇、改革的正當性喪失、改革的民眾抵制^⑥。下延至今，發自改革者方面

的改革終結論，大致斷定與表徵羅列多與此相似。但是，改革終結的論調似乎沒有被中國社會所接受：不是人們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事實上遭遇的停滯甚至回流，事實上改革開放即便沒有終結，也是危機重重、寸步難行；中國社會不願承認改革開放終結，更多的是因為意願上的緣故：改革帶給中國如此巨大的進步，它怎麼能在故意或無意中被終結掉呢？

這就是改革終結論雖然有些空谷足音的感覺，但呼應者甚少的緣故：不是由於論述者缺乏理據，而是舉國都不願意看到改革開放終結。在這一強大無比的社會意願面前，改革即便已死，它的名義性是絕對不會退場的——這既有國家權力當局借重改革來重建國家權威的考慮，也有民間借重改革來表達願景的意圖。因此，在重啟改革開放的論述面前，改革終結論是缺乏社會響應的，改革重啟論因而總是在中國回盪。重啟改革的言論非自今日始，有論者認為，198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便已終結，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就是對改革的一次重啟。而2002至2012年中國沒有推出真正有價值的改革舉措，事實上終結了改革開放。因此，2013年當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時，人們就有理由認定，這是四十年來改革開放長過程中的第二次重啟。長程綿延、短程中斷與兩度重啟，構成改革開放的整部歷史。

改革重啟論，旨趣在於攻堅克難。誠如論者指出：「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重啟改革議程，真實地、而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 到民主法治模式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 的轉型。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① 國家似乎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回應了改革重啟論者的核心關注。但困難在於，好的方案如何可以轉化為實際行動。執政黨領袖告誡地方幹部群體：「要吃透中央制訂的重點改革方案，同時完善落實機制，從實際出發、從更具體問題入手，見物見人，甚麼問題突出就着重解決甚麼問題，使改革落地生根。」^② 這一三番五次的提點充滿話外之音，讓人醒覺改革落地生根的艱難困苦。經濟起飛之後的中國，還能借助改革開放實現持續增長嗎？問題的答案，可能只有留給來者了。緣何如是？古往今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耳！

註釋

①③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通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17；317；315、316、324-25。

② 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將1957到1976年這一階段定性為「左傾二十年」。參見袁永松、王均偉編著：《左傾二十年：1957-1976》（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93），頁1。

- ⑤ 所謂「後發劣勢」是指「通過技術模仿，後發國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就是『對後來者的詛咒』」。參見楊小凱：〈後發劣勢〉，《新財經》，2004年第8期，頁120。
- ⑥ 參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
- ⑦ 這是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題為〈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中的一段話。參見人民網，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830/2830.html。
- ⑧ 金觀濤：〈球籍——中華民族憂患意識的復活〉，載陸一主編：《球籍：一個世紀性的選擇》（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頁231-32。
- ⑨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通過），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5。
- ⑩ 陳雲認為，對錯誤批判和處分的領導人應當糾錯，而對犯錯誤的領導人應追究責任，對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應予平反。參見陳雲：〈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1978年11月12日），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15-17。
- ⑪ 陳雲：〈堅持按比例原則調整國民經濟〉（1979年3月21日），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42。
- ⑫ 葉劍英：〈向着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1979年9月29日），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頁79。
- ⑬ 參見曹晉：《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183-96。
- ⑭ 田炳信：〈我親耳聽到鄧小平說：殺出一條血路來！〉（廣東省委原副書記王全國採訪錄），《新快報》，2006年2月26日。
- ⑮ 對廣東改革開放影響深遠的兩任領導敢於打破政治禁忌，勇於進行改革探索的事跡，參見黃碩忠：〈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習仲勛在廣東〉，《同舟共進》，2013年第8期，頁17-20；徐慶全：〈我在大是大非中認識了任仲夷——杜導正同志訪談錄〉，《炎黃春秋》，2006年第1期，頁10-17。
- ⑯⑰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袁庚：「蛇口精神」締造者 無畏無私改革家〉，《特區經濟》，2018年第3期，頁12；13。
- ⑱⑲ 于光遠：〈談談對深圳經濟特區幾個問題的認識〉，《經濟研究》，1983年第2期，頁28；29。
- ⑳ 陳文鴻：〈深圳的問題在哪裏？〉。轉引自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問題、困境、痛苦的選擇》（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129-31。
- ㉑ 何博傳：《山坳上的中國》，頁133。
- ㉒ 馬立誠：〈改革開放以來的四次大爭論〉，《領導文萃》，2008年第20期，頁15-31。
- ㉓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4。
- ㉔㉕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852；1856。
- ㉖ 參見趙智奎主編：《改革開放30年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746-98。
- ㉗ 從未到過特區的陳雲，在1992年明確表示「特區要辦」，特區「發展確實很快」，而且承認「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複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參見陳雲：〈悼念李先念同志〉（1992年7月21日），載《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頁2126。

- ⑳ 石廣生口述，汪文慶、劉一丁整理：〈中國「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回顧〉，《百年潮》，2009年第7期，頁17。
- ㉑ 參見車玉明：〈十五年的壯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回顧〉，《瞭望》，2001年第39期，頁3-5。
- ㉒ 參見〈加入世貿組織15年，中國與世界共精彩〉，《北方經貿》，2016年第12期，頁2。
- ㉓⑳ 習近平：〈不忘初心，繼續前進〉（2016年7月1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頁38；36。
- ㉔ 胡鞍鋼：〈2016中國經濟發展十大亮點：提前實現GDP翻兩番目標〉，《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4日。
- ㉕ 參見秦朔：〈河西河東，似水流年，無愧你所在的歲月就好〉（2018年2月5日），搜狐網，www.sohu.com/a/221032466_313170。
- ㉖ 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2012年11月29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頁35-36。
- ㉗ 習近平：〈「一帶一路」和互聯互通相融相近、相輔相成〉（2014年11月8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頁497-99。
- ㉘ 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015年9月28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頁521-26。
- ㉙ 王海京：〈中國崛起的國際鏡鑒〉，《瞭望》，2006年第50期，頁56-57。
- ㉚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學習時報》，2003年11月17日。
- ㉛ 參見奈（Joseph Nye）：〈巧實力必須回答五個問題〉，《全球化》，2012年第4期，頁40-44。
- ㉜ 林毅夫：〈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經驗〉，載林毅夫、姚洋主編：《中國奇蹟：回顧與展望》，上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37-76。
- ㉝ 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多麗絲·奈斯比特（Doris Naisbitt）著，魏平譯：《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頁2-3。
- ㉞ 施廷克爾（Oliver Stuenkel）著，宋偉譯：《中國之治終結西方時代》（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17），頁30-55。該書英文原題為*Post-Western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其中文譯名投射了國人對國外學者正面肯定與高度褒揚中國的強烈期待心情。
- ㉟ 羅斯托（Walt W. Rostow）：〈主導部門和起飛〉，載羅斯托編，賀力平等譯：《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13。
- ㊱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明確指出：「『自我持續』增長的概念（和階段）具有使人產生誤解的過份簡單化的含義。沒有一種增長是純粹自我持續或自我限制的。」參見庫茲涅茨：〈評起飛〉，載《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頁48。實現經濟起飛的經濟體以自我持續增長而不至於停滯或倒退，與很多後發國家的發展事實是存在距離的。
- ㊲ 參見羅默（John E. Roemer）著，張晉華、吳萍譯：《分配正義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1-12。
- ㊳⑳ 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2年6月號，頁4；4-8。
- ㊴ 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讀書》，2012年第12期，頁7。
- ㊵ 習近平：〈使改革落地生根〉（2016年1月4日-6日），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頁108。